

往事如昨

# 走亲戚

刘美花

除夕夜的雪半夜骤停，天未亮，村里鞭炮轰鸣，我们这些孩子放完鞭炮，便结伴去各家各户问好。待回家时，天已蒙蒙亮，饺子已端上桌。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普通的除夕。

大年初一，便要上路走亲戚了。我家初一要走的亲戚在栖霞大柳家镇马家河村。母亲提前将年礼备在篓子里，六个枣饽饽、一塑料袋炸果、一包桃酥。一条崭新印红福字的毛巾，蒙在篓子上。这便是年礼，需送出的心意。向西出村口，通往八田村的小路崎岖得很。我和妹妹轮换提着，不觉得重。过了上、下八田村，要走缠在山腰的羊肠小道，一路上坡，篓子也愈发沉。呵气成霜，我们都成了白胡子老人。

麦田被雪被盖着，四周白茫茫，初一一般人家不走亲戚，我们是回祖籍才初一走的，路上静得让人心虚。我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歪倒在雪地里，篓子滚出老远，那蒙着的毛巾飘到树枝上，大饽饽竟滚下田埂。我膝盖生疼，心慌得顾不得伤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吆喝弟妹们：“快，快捡回来！”我们手忙脚乱地把沾了雪的饽饽扑搂干净，仔细数一下没少，重新装好，蒙上毛巾，再上路更小心翼翼。

到了马家河，我们先依次去大妈、二妈和三妈家，以及没出五服的叔伯家，再去已成家立业的哥哥家。不管进了哪家的院门，问一声好，门帘一挑，便被温暖包围。她们的脸笑成菊花，连声说着“来了好，来了好”。接过篓子放好，便问长问短，拿出糖果和点心给我们吃。去每一家，篓子里的礼品便在她们手里经历一场庄重的仪式，取走我们的，换上他们家的饽饽，拿走一包桃酥，放进她们家的蛋糕。内容在变，那篓子的重量和那份“礼”的完整性，却保持着原样。

午饭时，每家都争着留饭，情真意切。我心里有一杆秤，不选最年长的大妈家，怕她年长而劳累。其余几家，便由着他们“争夺”去。今年在这家，明年在那家，像是一种默契的轮值。不管在哪家，饭菜端上来，是年复一年的老样子：一大碗白菜肉片炖粉条，一盘炒土鸡蛋，一碟白菜和豆腐干切成细条的凉菜，一盘土豆丝。面食自然是白面饽饽、黄灿灿的发糕。我最惦念的，是席间那碟炸果，味道与母亲做得差不多，可总觉得更香一些。或许这便是“做客”的滋味，是看着别人为你忙碌、为你倾尽所有好东西的那份甜蜜。在谁家吃了饭，临走时，我必定要固执留下包点心的，这是母亲叮嘱的。她们总是推拒，可我的手更固执地要放下，放下了，这顿饭吃得才更安心，这份情谊才算有了着落。

下午辞别，更是一天里最温暖、最叫人留恋的时刻。我们执意要走，他们留不住，便要送，送出屋门和巷子，一直送到村东口的正路。篓子又回到我手上，重量依旧，内容却已变。他们站在小山岗上，不住地挥手，一遍遍地嘱咐：“看着路，慢点走！”“明年早点来！”我们点头，一边回头。走一段，回一次

头，那几个人影还在。再走一段，再回头，人影小了些，却还在那里，他们站成山岗上的树。雪地反着青白的冷光，唯那人影，是墨黑的、温暖的念想。一直到山路拐了弯，彻底看不见，我们才不再回头，心里被和善的目光填满，脚下的雪路也不觉得难行。天擦黑，回到家。母亲迎上来，她查看这被八家面食、八户烟火、八份不同的惦记塞满的篓子，满脸堆笑。把小燕子等动物面食分给尚小、不能走亲戚的小弟小妹，开始打点初二走亲戚的篓子了。

初二去柴西山姑姑家，三里路，心情最是雀跃，感觉不到篓子重。到后，姑姑总是把我的手攥在她温热粗糙的手掌里，拉我们坐到热炕头上，让我们吃饭桌上摆好的各种点心。姑姑家午饭的饽饽深褐色，咬一口，香甜得很。姑姑说，这是掺了板栗面的。炕桌上的菜，总有别处吃不到的，或是咸鱼蒸干茄子，或是用栗子炖的小公鸡。临走，她总留一个饽饽尝尝，给篓子里再装上她家的几个饽饽和好几包点心，还要塞给我们每人一张皱巴巴却叠得方正正的压岁钱，这钱是她辛苦绣花赚的，带着她的体温。我们推让，她便真生气，那钱最终总是落进我们的口袋。姑姑对我们的那份爱纯粹而深厚。

初三，要走十里路去海阳求格村大姨家，这则是另一番滋味。路较平，你追我赶，我们会超几波步行的人。到大姨家近中午，她从矮旧的茅草屋颤巍巍走出迎接，很快便忙着张罗做饭。我便抢着去帮忙，把篓子里预先准备好的包子拿出来，搁在锅里蒸着，拉风匣烧火，对大姨喊：“姨，热几个包子就行，别弄菜了！”她应着，还是哆哆嗦嗦地做了两个菜，她想继续做，被我劝住。吃着大姨做的菜，看着她慈祥的笑容，别有一种暖。母亲事先叮嘱过，绝不能收大姨的钱。当大姨那枯枝似的手指，捏着同样皱巴巴的票子递过来时，我们的推拒是坚决的，大姨的眼神黯淡下去。我们离开时，她瘦弱驼背的身影站在村口的风里，白发乱飞，她用手抹一下眼角，我的心猛地一抽，大姨像风雪中的一株芦苇。

二姨早去世，至于四姨、舅舅和姥姥家，在二十几里外的岚店村，那便近乎远征。需要翻过榆山，路险雪深，非得等雪化，我家的客接待完，父母领着，组成一支小小的家庭队伍，带上更周全的礼物，像完成一项重要的仪式才行。那一路的艰辛与到达后的欢腾，是年节的高潮，是压在箱底最重的那幅画，轻易不展开看。

如今拇指一动，祝福和红包便能秒速飞越。走亲戚有风驰电掣的车，真快啊，社会发展真快。早年走亲戚的情形已成怀旧时才会翻出的旧照片，那篓子，如今仍搁在记忆的角落里，蒙着尘埃。只有偶尔，当窗外飘起雪，或是闻到面食朴素的甜香时，它才会被忆起。我知道，那篓子里装的，远不止饽饽、炸果和点心，而是投入了时间和真情，需要用体温去交换的，是再也回不去的记忆。

# 方寸世界

王锦远

倘若退回三四十几年前，你若随意走进一户胶东农村的人家，不经意间便会发现：堂屋中那个古铜色一米多高两扇门三斗屉的壁橱上方，总挂着几幅或大或小的相框。这是家家户户的标配和生活里缺不得的物件。

框中嵌着的照片，宛如被时光揉皱又小心展平的信笺——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泛黄的黑白影像，到六七十年代人工着色后的水彩肖像，再到八十年代以后色彩浓烈、光影饱满的彩色照片，长长短短，方方正正，默默堆砌起一个家庭的记忆、变迁与荣光。

照片里的人物，就是一本摊开的族谱。有祖辈穿长衫的黑白影像，眉眼间凝着旧时代的风霜，照片边缘已脆如枯叶，却仍能看出端坐时的郑重；有父辈年轻时的模样，穿的确良衬衫，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，眼神清澈；更多的是小字辈们的笑，彩色照片里的红棉袄、绿军装、牛仔褲、学士服等，把时光拉得丰富多彩、鲜活明亮。这些照片从不是简单的影像，它们是母亲纳鞋底时念叨的往事，是父亲酒后讲的奋斗故事，是维系一个家庭的根与魂……

最先撞进眼里的，是占据在相框中间的全家福。它就像一页时光的存根。相框里的人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辈分长的坐在太师椅上，怀里搂着最小的娃；年轻的挤在后排，肩膀挨着肩膀。拍照片的日子多半是好日子，或是春节，或是老人寿辰。那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，就像一朵朵芬芳四溢的鲜花，永不凋谢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家福里，人人胸前别着小红花，背景是手绘的红旗；七十年代的照片里，孩子们穿着或大或小的衣服，却把红领巾系得笔挺；九十年代的相框里，有人举着大哥大，有人穿着西装，身后是新盖的砖瓦房。每一张全家福都是一次时光的打结，把散落各地的牵挂系成一团。长辈们看着照片里绕膝的子孙，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蜜——那些起早贪黑的劳作，那些油灯下的缝补，都在这一帧团圆里得到了百倍千倍的补偿。

相框的大半天地，属于家里的年轻人。他们是照片里最鲜亮的色彩：穿军装的小伙子站在营房前，军帽檐压得很低，嘴角却藏不住得意；戴眼镜的姑娘捧

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背景是县城照相馆的假布景，却笑得比布景里的花还艳；还有穿工装的、戴安全帽的，哪怕只是在镇上工厂当学徒，照片里也透着一股子“有出息”的劲儿。这些照片被仔细地摆在相框前排，玻璃擦得锃亮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谁家要是有一张孩子穿军装的照片，能在村里炫耀半载；八十年代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照片比年画还金贵。孩子们寄回照片的日子，是家里的节日，往相框里塞时，会特意腾出最显眼的位置，孩子他爹在村口抽烟时，会有意无意跟邻居提一句：“俺家小子在烟台厂里当技术员了，照片刚寄回来。”这话里的骄傲，比烟袋锅里的火星还旺。

相框里偶尔会躺着些“大家伙”——那些又长又宽的合影，像一群照片里的巨人，占着不小的地方。有小学毕业照，前排坐的老师梳着齐耳短发，后排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裳，却把胸脯挺得老高；有工厂里的师徒合影，师傅叉着腰，徒弟们站成一排，背景是轰鸣的机床；还有部队的战友照，人人穿着厚厚的棉袄，军帽上的红星在黑白照片里也透着光。

最让人心里发暖的，是相框里的红与白。红的是新娘的盖头，白的是婚纱的裙裾，新郎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哪怕是租来的，也熨得没有一丝褶皱。照片里的新人多半有些拘谨，新娘的手被新郎攥得紧紧的，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。旁边往往挨着一张婴儿照：皱巴巴的小脸，攥着拳头的小手，裹在红布里，像个刚出土的红瓤地瓜，憨得让人心头发软。这两张照片是家里的“喜帖”，藏着一个家的新开始。

每年腊月扫尘，擦相框是件大事。母亲会踩着板凳，用软布轻轻擦去玻璃上的灰，就像给孩子擦脸一样。擦完了，还要把照片重新排列组合：新添的孙子满月照，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；那张有点褪色的全家福，被挪到中间，挨着新照片，像老人牵着孩子的手。有些老照片边角卷了，会用胶水小心地粘好，添添换换、排列之间，相框里的人越来越多，日子也像相框里的照片，一点点丰满起来。

这方寸之间的世界，其实从未走远，它只是换了个地方，住进了每个人的心里，成了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念想。